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JIANGXISHENG ZHIXUE SHEHUI
KEXUE CHENGGUO WENKU

“故事”的多重讲述 与文艺化大众

——“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
文本发生学现象

THE "STORY" OF MULTIPLE NARRATIVE AND
THE WORKS OF EDUCATING THE PUBLIC

龚奎林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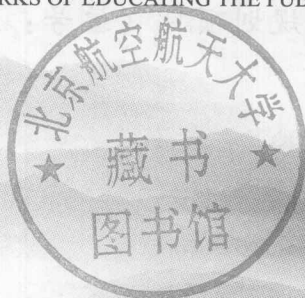
014033794

1207.425
37

“故事”的多重讲述 与艺术化大众

——“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
文本发生学现象

THE "STORY" OF MULTIPLE NARRATIVE AND
THE WORKS OF EDUCATING THE PUBLIC



龚奎林 著



北航 C1722101

1207.425

3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事”的多重讲述与艺术化大众：“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文本发生学现象/龚奎林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2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7-5097-5259-3

I. ①故… II. ①龚…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5164号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故事”的多重讲述与艺术化大众

——“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文本发生学现象

著 者 / 龚奎林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孙燕生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 / 高忠磊 卫 晓

项目统筹 / 王 绯 周 琼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5.5

版 次 / 2013年12月第1版

字 数 / 402千字

印 次 /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259-3

定 价 / 8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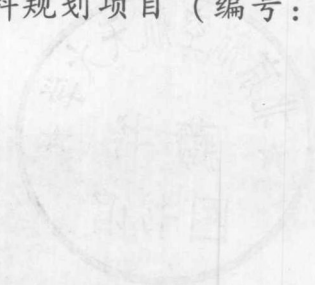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014033784

“故事”的多元叙述
大众文艺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青年基金
(编号: 10YJC751020) 成果

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 (编号: 11WX52) 成果



著 林金英

江西出版文学研究会

总 序

作为人类探索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成果，社会科学承载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特殊使命，在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以创新的社会科学成果引领全民共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这是时代发展对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

江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称。千百年来，勤劳、勇敢、智慧的江西人民，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大地上，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在这片自古就有“文章节义之邦”盛誉的赣鄱大地上，文化昌盛，人文荟萃，名人辈出，群星璀璨，他们创造的灿若星辰的文化经典，承载着中华文明成果，汇入了中华民族的不朽史册。作为当代江西人，作为当代江西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有责任继往开来，不断推出新的成果。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给出科学的答案。汲取历史文明的精华，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新任务的要求，创造出今日江西的辉煌，是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愿望和孜孜以求的目标。

社会科学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价值在于推动社会进步、提升文明水平、提高人的素质。然而，社会科学的自身特性又决定了它只有得到民众的认同并为其所掌握，才会变成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因此，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和其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其成果的运用、交流与广泛传播。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发展，我们设立了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出版资助项目，全力打造《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由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设立，资助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优秀著作出版。该文库每年评审一次，通过作者申报和同行专家严格评审的程序，每年资助出版30部左右代表江西现阶段社会科学研究前沿水平、体现江西社会科学界学术创造力的优秀著作。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涵盖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收入文库的都是具有较高价值的学术著作和具有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的社会科学普及和成果转化推广著作，并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希望通过持之以恒地组织出版，持续推出江西社会科学研究最新优秀成果，不断提升江西社会科学的影响力，逐步形成学术品牌，展示江西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群体气势，为增强江西的综合实力发挥积极作用。

祝黄河

2013年6月

序

孙先科*

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巨大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的开始，加之在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翻云覆雨，“十七年”文学的发生语境是极其复杂的，甚至可以用波诡云谲来形容，这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可以解释作品发表以后被反复修改的“无定稿现象”。基于相似的原因与意识形态普及的需要，“十七年”文学作品不仅被反复修改，而且被反复“改编”——以戏剧、电影、电视、戏曲、曲艺、连环画、插图等不同的艺术形式对原作不断地“重述”。而长篇小说具有巨大的生活容量，包含着丰富的社会信息，与语境有更复杂的关联；且长篇小说的创作周期长，过程艰难，定型化程度高；就形态学特征而言，长篇小说具有更大的敞开性、未完结性。因此，长篇小说也具有更大的修改、改编的可能与必要。事实的确如此，“十七年”的长篇小说的修改、改编不仅十分普遍、规模巨大，而且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文艺现象。

基于上述原因，在2007年我以“经典与经典的‘重述’——‘十七年’经典长篇小说的修改、续写、改编及其历史阐释”为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并得到资助，奎林是此课题组的主要成员。在设计课题时，

* 作者为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南师范大学副校长。

我的主要想法是以“重述”作为切入点，将二度、三度创作与初文本相比照，以文献为基础进行文本阐释和历史阐释。考虑到可行性，我选择了有代表性的12部长篇小说，而“重述”形式也主要考虑的是影视改编。

这种将文献考校、文本阐释与历史阐释结合起来的思路显然非常吻合奎林的学术兴趣，他不仅承担了课题中的部分内容，而且将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方向。经过几年的辛苦努力，他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以《“故事”的多重讲述与文艺化大众——“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文本发生学现象研究》为题提交答辩，论文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这部书稿就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集中、精炼、提高的成果。

尽管全书是承续上文提到的那一课题而来，但目前的这一书稿比最初的设计是有所突破的，放到“十七年”文学研究序列中是有创新性的。依我之意有以下几点。

第一，标题中的“文艺化大众”是这部书稿的一个关键词，尽管书稿中直接涉及它的文字并不多，作者也未对它作详细的知识考古与辩白，但它却标指出作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基本的逻辑判断，即一个“故事”之所以被反复讲述，是因为创作者遵从意识形态的导引，通过“通俗化”的改写、改编完成对大众的“训化”。“重述”现象之所以频繁地发生，它不是偶然地、单一权力作用的结果，而是主流意识形态、作者与读者共同“合谋”完成的一场文学盛宴。这一思路比单一的称赞或指责都更加接近实际。

第二，“文本发生学现象”研究显然就是对文艺如何“化大众”的路径与方法进行具体的研究。作者将长篇战争小说的版本修改、艺术改编及传播推广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叉场域进行知识考古和社会历史分析，研究版本修改与艺术改编发生的历史动因及其与革命伦理变革的复杂博弈关系。这一研究思路是颇为新颖的，也显示了作者求真务实的学风。

第三，在资料的搜集、梳理方面下了大功夫，尤其是在曲艺、戏曲、连环画的改编方面用力甚勤，搜罗到了丰富的资料，对于“化大众”的研究起到了非常有力的支撑，显示了作者扎实的资料爬梳与分析能力。与目前学界涉及此论题时多以电影、电视剧为支撑材料相比，又不能不说是

一个有分量的突破。

文本发生学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论域，既涉及历史的复杂性也涉及理论的复杂性；文体与文类之间的转换可做历史研究，又不能不涉及理论与美学问题。对于一个崭露头角的年轻学人来说，进入如此复杂的学术领域是难免出现粗疏、遗漏和偏误的。希望奎林在日益精进的同时，也祈望同行师友示误指瑕！

是为序。

2013年10月1日

前 言

在中外文学史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许多作品在出版前后经过了作者的反复修改，从而形成多个有差异的版本。而且，其中很多优秀作品在随后的历史变迁中又被改编为各种艺术样式广为流传。“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尤为如此，作者和改编者通过对革命故事的裁剪、润色与修整形成多重故事讲述和复调对话场域。在对话中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文艺化大众，但形式的变异也导致了文本的变异，这种异质化的内涵就需要重读。如果说版本修改是作者的自我行为，那么后一种艺术改编可以说是他者行为。尽管艺术改编也可能由作者自身来作为编剧，例如1956年生产的电影《铁道游击队》就是作者刘知侠担任编剧并改编的。但是，在拍摄中导演通常根据历史语境对电影剧本进行调整，电影呈现的依然是导演的修改特性。所以，本文把作者的版本修改称作革命意义的“重述”^①，而把他者进行艺术改编与传播叫做“转述”。这种“重述”与“转述”都是围绕具体作品的文学发生和流变过程，这种现象笔者把它概括为文本发生学现象。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小说的修改版本以及艺术样式改编的各个叙事指称文本进行互文性意义比较，因为文本内的差异和艺术样式改编的形式

^① “重述”这个词语来自孙先科教授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典与经典的‘重述’——‘十七年’经典长篇小说的修改、续写、改编及其历史阐释”，笔者在此引用，感谢孙老师。

及内容都是在意识形态话语运作机制下产生的，其文艺化大众的意义功能较为显明。通过这种差异性比较，我们能够在统一的文化象征结构中获取隐秘的逻辑意义。因为这种文学参与公共政治和革命伦理的象征结构“不仅表达社会中支配性的结构，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帮助建构并再生产了这种结构……象征结构正是通过权力场域（field）与文化场域之间结构性同源而塑造日常的意识和支配的支柱关系。”^①文化象征资本的话语重构意味着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在革命伦理的规训下，必须通过文化象征符码和革命意象体系去建构文学文本，进而产生革命与读者所需要的相关知识。

因此，本文研究对象就是“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文本发生学现象，不仅关注同一文本的不同表述所形成的革命话语“重述”与“转述”，考察“重述”与“转述”的意义生成的差异与缝隙，更要穿越表述背后的话语情境和历史语境，追问作者和艺术改编者为何要进行版本修改方面的重述和艺术改编的转述。这种重述和转述是如何作为一种被不断打造的知识形态生成的？这种文化资本的更迭背后的权力博弈是怎样的？从而寻找不同艺术版本之间的复调对话的可能和文本间性。下面对本文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进行具体阐述。

一 研究对象与研究现状

（一）研究对象：“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文本发生学现象

“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共产党建立新秩序的法宝，新生的政权消灭了反动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成为中国大陆政权的唯一合法继承者和领导者，并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取代了原来的“中华民国”，用天干纪年取代了原来的民国纪年。新中国政权必须借助国家机器建构自己的合法性依据，使民众了解“政权更迭”的必然性、有效性和优势性。这就要求一方面通过政治权力清剿“匪特”和“反革命”，形成和平稳定的环境

^① [美] 罗伊克·华康德：《从意识形态到象征暴力——马克思与布迪厄著作中的文化、阶级与意识》，褚思真编译，载《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3年第2卷（总第3期）。

来发展民生；另一方面，通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上层建筑的扩张，建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合法性话语，在文化、哲学、艺术、个体思想等领域进行一系列的“清理”与“改造”工程，使之走向文化政治的有效性统一。所谓“合法性”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的被承认”。^①所以，为了奠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被认可的合法性价值基础，通过文学尤其是战争小说的意义诉求告诉民众新中国是如何诞生以及如何为共产党自建立以来是如何为民请命和如何拯救民族的，并通过典型艺术形象向读者宣传、普及有关共产党及新政权从形成到建立的历史知识。于是，革命文艺工作者通过文学想象及虚构与革命历史重合，进行国家意识形态的生产和推广，在文艺大众化的基础上实现文艺化大众的目的。

同时，作为通过武力对抗的战争不仅改写着历史的叙述和社会的变迁，而且改写着政治的角逐和个体命运的惶惑。战争带来的不仅是社会的动荡、生命的消失以及物质毁坏，更带来了人的心灵伤害、精神恐惧以及命运迷茫的无可归依感，笼罩在战争阴影中的个体生命及其悲欢离合的生命体验如同血色黄昏令人无法平静。随着革命起义夺取的新政权的诞生和战争的结束，战争文艺开始成为颂扬式宣教功能的号手。这些从生与死的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战士、军队随军记者和部队文艺工作者，甚至直接担任过军队指挥的干部，他们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他们既是战争的目击者，也是战争的参与者。对战争中民众和战士的生活与情感有着深切的体验，也积蓄了大量的战争素材，特殊的战争经历使他们通过小说，把昨日战争的艰难和今日胜利的来之不易表达出来。不仅纪念那些还没有看到胜利就已经捐躯的战友，更反映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与优越性，也表达出自己对党的无限忠心，而且在精神心理学意义上满足了他们对于文化/文学的敬畏与梦想。于是，在政治的鼓励与暗示之下，他们通过自

^① [德]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184页。

己对革命历史的回忆、记录、整理进入文本创作。正如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直截了当地呼吁作家：“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么，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它们将要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而且还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① 所以，以战争为主题的文艺蕴含着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怀、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对鼓舞人民建设新中国和教育下一代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就成为“十七年”文学出版业中最为显著的类型。在许多影响较大的文艺丛书中，战争文艺占了重头戏。如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文艺建设丛书”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出版编审处组织编写的“解放军文艺丛书”等，受到读者热捧，这对经历过战争但没有创作经历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更具有典范的作用。而《红旗飘飘》《志愿军一日》、纪念解放军建军30周年等革命回忆录以及其他各种文艺竞赛的大型文化工程无疑促进了战争小说的创作，产生了许多战争小说，如《新儿女英雄传》《风云初记》《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红日》《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战斗的青春》《烈火金刚》《苦菜花》《迎春花》《平原枪声》等^②相继出现。

①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人民文学》创刊号，1949年10月号，《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512~513页。

② 其他小说在后面的图表中列出，另外还有《黄继光》《祖国的儿子黄继光》《杨连第》《董存瑞的故事》《一个普通战士的成长》《盼望》等战争传记小说，这类直接描述武装斗争的小说笔者称之为“主战争小说”。本文主要探讨这一类型小说。另外还有一些小说尽管穿插着武装对立的战争，但这只是为提供特定语境和出场背景的次要内容，主要还是叙述人物成长，以及越狱、地下斗争等内容，如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杨沫的《青春之歌》、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梁斌的《红旗谱》、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张良孟的《儿女风尘记》《三辈儿》、曾秀苍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碧野的《阳光灿烂照天山》、纪宁的《红心向太阳》、袁静的《红色交通线》、冀汭的《走夜路的人们》、谷峪的《石爱妞的命运》、林予的《寨上烽烟》、老舍的《无名高地有了名》、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一、二卷）等，笔者把这类小说称之为“次战争小说”，或者说，它们属于革命历史小说。

战争对永恒秩序进行强势整合，与和平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年轮，故成为文学的母题之一。透过战争，人可以发现生存的本相，从而审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终极性。因此，战争小说^①是以两个或多个不同政治主张的武装派别直接进行对抗，以夺取胜利的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战争过程为载体，反映战争中人的命运、情感、道德、行为、意志的小说。但是，任何一个个体都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在事件与空间构建的时空场中生存，人、文学、战争都离不开政治的制约。这类小说遵循着战争文化惯性中累积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致使在主体建构和人性建构的层次上“一边倒”，消解了文学的复杂性。于是，战争小说成为政治权力背影下的单一化情节模式：“我方必胜，并代表正义；敌方必败，并代表邪恶”，其人物的心理变化，以及命运、情感等打上了阶级属性的烙印。此类小说传播迅捷、异常畅销。可以说，在“十七年”文学中，战争小说占了很大篇幅，而长篇战争小说又是其中的重头戏。一般而言，我们把不超过10万字的小说称为中篇小说，而10万字以上的称为长篇小说。两者最主要的区别还由小说容量和篇幅大小、结构复杂程度来决定。在“十七年”时期，同一个版本在1956年以前的繁体竖排印刷和1956年以后的横排印刷方面，其版权页字数往往不同。而且，有的小说十四五万字，在文学刊物连载或单行本印刷时仍然称为“中篇小说”，例如，任大星的13.8万字的《野妹子》，作者自己也认为是中篇小说。^②因此，本论文统一把达到或超过10万字的小说都叫做长篇小说，虽然文学不是按数字推算，但还是按照常规进行规范，即使如9万多字的战争小说《松毛岭下》^③依然是中篇小说。长篇战争小说的篇幅，更能细致、具体地传递出新中国诞生的艰难性和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必然性。

而长篇战争小说颇受欢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革命的受众。当时社会主体主要是阅读水平较低的工农兵和有阅读水平的知识分子，他们迫切需要知道从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历史，以丰富自己原有的

① 如果说黄子平把“十七年”小说定义为革命历史小说成立的话，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革命历史小说就是战争小说。

② 任大星：《野妹子》，百花文艺出版社，1978，第256页。

③ 钟廉芳、张春熙：《松毛岭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

文化知识储备。前者大约是文盲或者半文盲的文化水准，他们在扫盲中开始速成识字，但也只能接受一种形象生动的故事讲述来植入相关革命记忆。后者包括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知识分子，前者掌管着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权力，在革命阅历和革命意志上与作家或者作品中的革命者达到精神同构。他们不仅愿意阅读革命同道写出的小说文本，而且更愿意以自身经历去构思文本创作，而对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来说，需要阅读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以自我改造，更需要弥补自己的革命知识。革命战争小说的出现无疑为这些读者提供了具象化的“精神食粮”和生动的“革命知识”。这种革命教育是必需的。

因此，在革命伦理的政治文化一体化规范下，生动又通俗的文学作品已经成为另一种“历史教科书”。“十七年”文学包括战争小说构成了具有“历史代述”功能的历史书，而新政权更是需要吻合政治变化的文学描述，于是两者产生重构。这种知识的生产、修改、改编与传播便维系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与运作过程。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想象，新民主主义革命重大历史事件通过文学的确认与传播使之成为确定的历史事实和知识构成，这就要求作家对历史记忆、现实体验的叙述与时代话语相一致。所以，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学中，文学更多的是承担教育功能。当然，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功能。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源流》中说道，中国文学是由言志派和载道派构成，两者相互轮流替换。这说明“载道”自古以来一直是文学诉求的一种方式 and 目的。但这并不能否定文学的审美性、文学性以及启蒙性意义，或者说这两种功能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只是1949年以后的文学生产已经开始对文学审美性等进行祛魅，而建构起意识形态功能的意义所指，战争小说不仅是作家审视人生和世界的审美窗口，而且是能更好地承载阶级斗争和革命主题的“工具场”，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已经被政治启蒙性所替换。因此，以工农兵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英雄与反动派成为小说文本中意义诉求的两个象征符号。人性善恶的天性与战争的复杂在革命伦理的规训中走向简单和纯净，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战时共产主义文学规范是文学的逻辑起点。在文本中形成了陈思和所说的“我军”与“敌军”两大语言系统，人成为进步与落伍、光明与黑暗、抗争与挨打、解放与堕落的两极符号。

而对这一时期战争小说而言，意识形态谋求对新生政权合法性的印证，读者则在咀嚼战争的固定程式中体验到快意恩仇。于是，战争小说也就成为“十七年”民众最为喜爱的一种文学诉求样式。

而且，“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借助版本修改、艺术改编与传播等受到不断推广，才在文学上表现出了洪子诚所概括的“当代文学一体化”现象和陈思和所论述的“共名”状态。例如《红日》，自1957年在《延河》等刊物上选载后，经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审定，作为解放军文艺丛书之一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7月初版，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长篇小说连播节目里播讲。初版后，先后于1959年、1964年作了重大的改动，其中1964年的二次修改本改动最大，1978年第20次印刷时，恢复了1964年版本。然而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1980年第21次印刷时，则放弃了1964年的版本，恢复了1959年的修订版，此后所有版本都是以1959年修订本为蓝本，总印数达200多万册。在艺术改编方面，《红日》经历了电影、连环画、电视等多种艺术改编，传播很广。

不仅小说《红日》如此，几乎所有的“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都经历了反复修改再出版和各种艺术样式改编的过程。1949~1966年被改编成电影、戏剧的小说还有《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苦菜花》《新儿女英雄传》等。这些作品也被改编成连环画（包括电影连环画、戏曲话剧连环画和绘画连环画），成为当时群众和少年儿童的主要阅读来源，其印刷数量惊人，大多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册。但是“文革”时期，“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几乎全部被贬成“毒草”，作家也受到批判，只剩下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等极少数作品。但是，这种语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改变。随着“文革”的结束，在1976~1978年间，“两个凡是”的思想依然在文艺界中萦绕。此时大部分在“文革”中被贬成“毒草”的作品开始复出。在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代的革命文化相互激荡，不仅活跃了思想，也活跃了与社会和思想相融合的文学。五四思想启蒙传统被重新激活，文学的审美性和人文性逐渐取代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被赋予的工具性，而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十七年”文艺开始逐步淡出观众视野。读者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革命故事讲述，他们似乎需要的是“人之所以为

人”以及充满人性张力的新文艺。所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读者更愿意关注具有思想启蒙传统的新时期文学。

随后，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全面复兴替代了20世纪50年代建构的革命价值体系和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精神启蒙传统，文艺逐渐走向边缘化。在外来文化和金钱诱惑下，人们原有的精神信仰和伦理价值体系开始被替换，金钱崇拜和消费文化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受众在欲望化、快餐化、读图化的时代更注重享受。同时，伴随而来的是民主价值的推进、国家文化机制的转轨、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价值多元体系的建立。在这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基础上，大众文化崛起并挑战着国家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的权威地位，欲望化泛滥叙事开始出现。而且视觉文化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作为视觉文化符号传播系统的影视契合了消费时代读者的视听需求，况且视觉享受比阅读思考更为快乐而轻松，文学被边缘化。于是，“十七年”小说的红色经典影视改编成为多方共赢的方式。红色题材影视剧本身就来源于具有革命意义和革命起源价值系统的长篇战争小说，所提供的图像符号和视听语言集娱乐性、思想性、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教育性于一体，具有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改造功能。不仅可以使受众了解新中国成立的艰辛历程和改革开放的来之不易，还可以通过革命者对崇高愿景的追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而树立起价值信仰中的一道丰碑。所以，“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获得了大量的影视改编的机会。演化出一场“红色经典”改编浪潮。在革命故事讲述中，日常生活与爱情人性成为影视改编中新的生长点。

所以，许多长篇战争小说从文本起点的初版本或初刊本便面临着被不断修改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经历了多次修改和多种艺术样式的改编与传播，这种现象在“十七年”非常普遍，笔者把它称为“文本发生学现象”^①。也就是说，文本发生学现象是指小说文本传播过

^① 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批评家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在著作《文本发生学》中提出“发生校勘学”或“文本发生学”（Génétiq ue textuelle）的研究范式，具体说来，通过考察和梳理由草稿或准备性资料到手稿，再到前编辑、编辑，前出版、出版阶段的前文本孕育过程，从而“观察处于初始状态的作品那种饱满而又生动的结（转下页注）”